中國經濟展望

劉遵義

能為楊振寧教授百齡華誕綴文，我深感榮幸。楊教授不僅是當世頂尖科學家，也是毋庸置疑的愛國志士，心繫中國人民的生計與福祉。此論文旨在向先生致敬，並闡述中國經濟如日方中，將欣欣向榮，望先生放心。

在2004年，我就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不久，劉青峰女士邀請我就「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展望」受訪，及後訪問以此為題，刊於《二十一世紀》①。今日能夠再次探討此題目，而且見到當年所說的已多半成真，令我深感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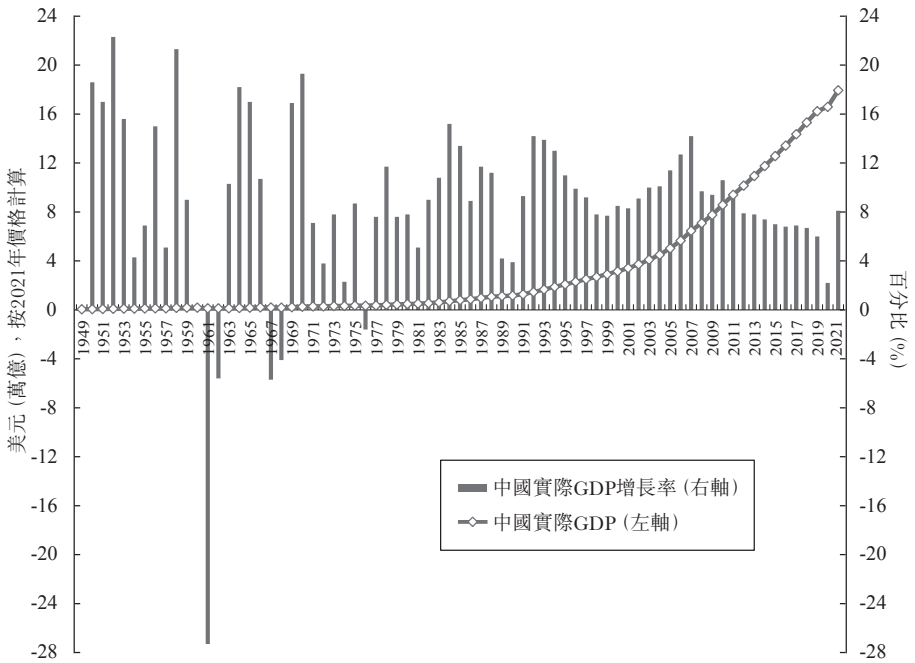
一　回顧歷史數據

按2021年價格計算，1949至2021年間，中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由3,29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515.5億美元②)升至114.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17.94萬億美元)，增長近350倍(圖1)。同一時期，按2021年價格計算，中國實際人均GDP從607元人民幣(相當於95.2美元)升至2021年的80,962元人民幣(相當於12,699美元)，增長逾130倍(圖2)。

如兩圖所示，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的二十年間，增長率有顯著浮動和波幅，但在1949至2021年間，實際GDP和實際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8.47%及7.03%，能橫跨逾七十年之久，實是成績卓越，空前未有。此成就主要歸功於1978年推行的經濟改革和向世界打開大門，以及往後中國經濟政策制訂者的高瞻遠矚，專注追求經濟增長，具備長遠的規劃視野，投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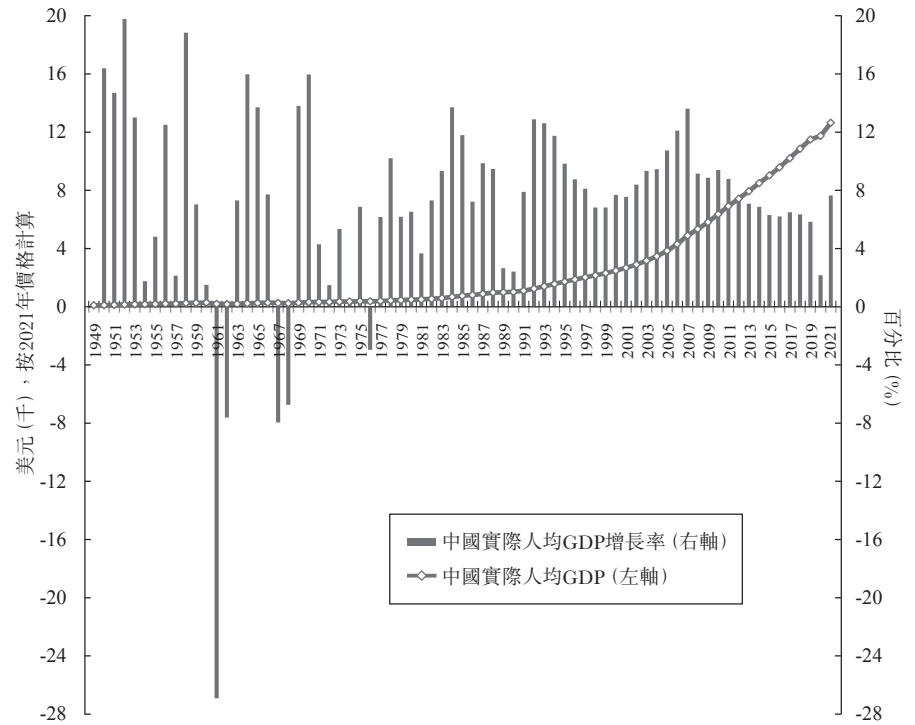
* 本文部分內容出自筆者於2022年3月發表的英文文章"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5, no. 1 (2022): 1-34。

圖 1　中國實際 GDP 及其增長率，1949 至 2021 年



資料來源：1950 至 1952 年間的增長率，參見國家統計局於 1959 年發表的數據；1952 至 2021 年間的 GDP 及增長率，參見國家統計局網。

圖 2　中國實際人均 GDP 及其增長率，1949 至 2021 年



資料來源：與圖 1 相同；1949 至 2021 年間的中國人口數據，參見國家統計局網。

「領先發展」的基礎建設，亦即市場尚未出現需求的基礎建設，但可以藉供應來帶動需求。這些基礎建設或需較長時間才能收回成本，不大可能靠私人投資來推動。

1978年是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之初，至2021年，按同年的價格計算，中國實際GDP增長逾40倍，從2.6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4,150億美元）升至114.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17.94萬億美元）；實際人均GDP增長近30倍，從2,749元人民幣（相當於431.2美元）升至80,962元人民幣（相當於12,699美元）。在這四十多年間，實際GDP或實際人均GDP的增長率，沒有一年是負數。實際GDP或實際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15%和8.18%，均高於自1949年以來的年均增長率。

然而，根據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數值③，自1983年起收入分配的確變得更不平均（圖3）。按照聯合國整合的數據，中國基尼系數曾從1953年的0.56跌至1983年0.28的新低，進步斐然。然後，數值回升並於2008年達到0.45（國家統計局數字為0.49）。據國家統計局顯示，此後數值於2020年回落至0.47，而當時美國基尼系數為0.49。縱然國人收入嚴重不均，但符合鄧小平先生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規劃。現在，是時候讓其他人也富起來，所以國家推行「共同富裕」政策。

圖3　中國基尼系數歷年變化

資料來源：參見聯合國大學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UNU-WIID)；國家統計局網。

2021年，中國GDP為17.94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23萬億美元）的78%，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④。但是，同年中國的人均GDP為12,699美元，遠遠落後於美國的68,971美元，前者僅及後者的18.4%，在全球經濟體中位列八十幾名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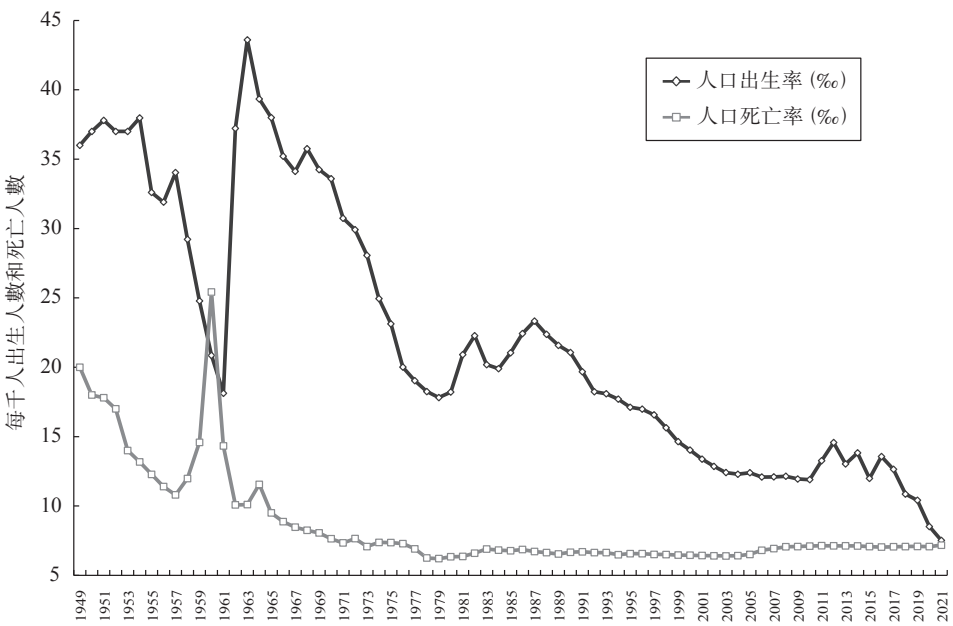
二　基本經濟因素

現在我們來審視一下中國的基本經濟因素，是否有足夠的初級生產資源，包括資本和勞動力，來繼續支持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國民儲蓄率一直高企，目前約為45%，無疑位列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首。這意味即使沒有外國直接投資或貸款流入，中國仍可有高投資率。不過，近年中國人口發展似乎帶來不利因素，人口正急速老化，淨增長近乎零，但勞動力供應的問題大致可控（下詳）。

中國國民儲蓄率從1952年的21.1%，升至1979年的36.8%，再升至2020年的45.7%。它將維持高位，為固定資產的每年新增投資提供必要的資源，如基礎建設、人力資本、研發；並提供教育、醫療、環境保育、保護和修復、安老及扶貧之類的公共物品。隨着家庭收入增長，加上更多家庭加入中產行列，家庭消費將會增加。不過，家庭消費與總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在過去六十年一直呈下降趨勢，於2020年分別只佔GDP不足40%和60%。僅靠這兩部分，並不足以支撐經濟持續增長所需的總需求。

中國的死亡率自1949年的2.0%降至2021年的0.72%，幾乎是年年下跌，反映經濟和公共衞生環境大體改善，惟大饑荒時期（1959-1961）例外，當時的死亡率曾短暫升至2.5%以上。中國的出生率亦從1949年的3.60%下跌至2021年的0.75%，略高於該年的死亡率（圖4）。這部分歸因於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以及在1980年推出、2016年停止實行的一孩政策所遺留的問題。

圖4　出生率及死亡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

雖然總人口的淨增長率，即出生率及死亡率間的差距，近乎零（圖4），甚至可能即將轉為負數，但導致嚴重勞動力短缺的機會不大。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可流向城市，這種持續的城市化可以滿足勞動力需求。儘管有人宣稱中國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⑤，但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2020年第一產業（農業）只產出GDP的7.3%，卻佔該年總就業人數的23.6%，所以仍能在不影響自身產出的情況下，為第二產業（製造、採礦和建築）和第三產業（服務）提供勞動力。

此外，法定退休年齡（女性為50至55歲，男性為60歲）於1950年代初訂立，但當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只稍高於60歲，此退休年齡在今天已不合時宜，是改變的時候了。目前的出生時預期壽命為逾77歲，如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應有助增加勞動力。在實施新法定退休年齡（例如65歲）前，可以訂立十年的過渡期，讓適齡人士可選擇原來的退休年齡，這樣便不會剝奪任何人現有的權利⑥。另外，過去數十年來，在教育和公共衞生方面的各類投資，令中國勞動力質素顯著提高。中國經濟的人力資本大幅增長（見第三節），因此，即使從數量而言，勞動力可能停滯不前，但勞動力的「效率等效」（efficiency-equivalent）量仍繼續增長。最後，採用人工智能的自動化和機械人技術，也可以提高勞動力的效率。近年生育限制放寬，法定結婚年齡亦有望降低，應有助逐步提高中國的出生率，但要待二三十年後才會見到對勞動力的顯著影響。

同時，中國一直增加研發方面的投資，在2021年達到GDP的2.44%。自2014年起，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專責處理全國的相關案件。近年，由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歐洲專利局（EPO）和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中國發現者和發明者的專利數量，均見長足增長。中國是現時世界上從這三個專利局中獲批予最多專利的國家，在多個範疇如5G通訊、北斗衞星導航系統、高鐵、量子通訊、超級電腦，以及特高壓輸電，均見到自主創新。假以時日，創新或技術進步也應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中國是人口大國，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因此可在生產和營銷兩方面，以及從邊做邊學（即通過重複生產相同商品來提高效率，例如高鐵）中，取得規模經濟優勢。此外，中國人口規模令它在能力分布方面享有「長尾效應」⑦。再者，中國是大型大陸經濟體，國內經濟一般不受外部干擾，情況與美國相似。故此，儘管中國的進出口增長率與其他東亞經濟體同樣波動，但實際GDP增長率仍相對穩定。展望將來，內需將會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而非出口。這情況不同於香港、南韓、新加坡和台灣這四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乃至日本，但與美國相似。

三　人力資本的增長

人力資本亦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經濟體的人力資本可藉改善教育和公共衞生來加強。傳統而言，或至少是二千年以來，中國人一直十分重視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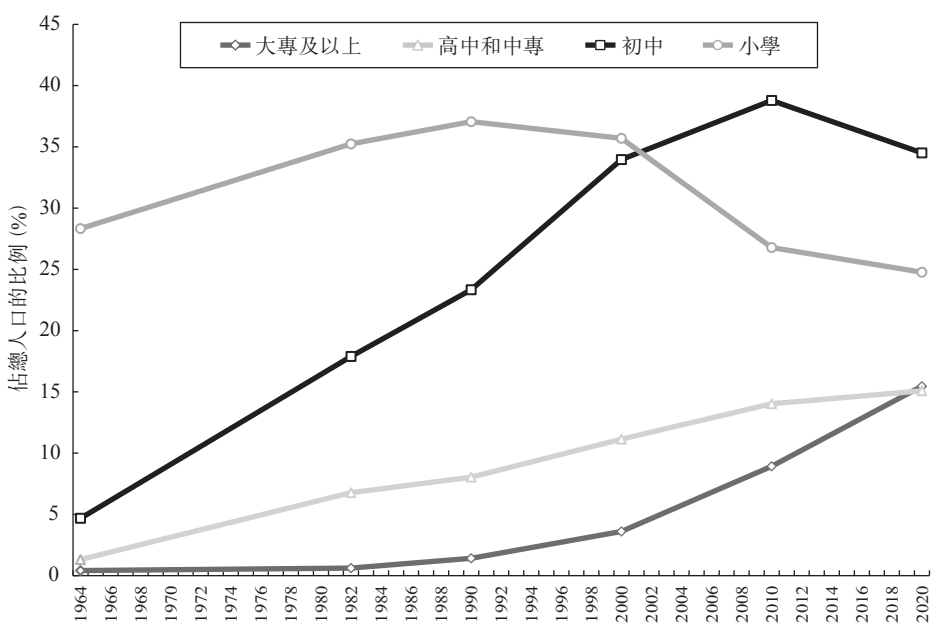
育。這主要是因為教育是一般人透過官方考試制度，在社會向上流動的少數途徑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途徑。直至二十世紀初，士人在舊中國的社會階級中一直居於首位，農民次之，之後是勞工，最底層是商人；僅憑財富不足以提高社會地位或得到敬重。

更廣泛來說，掃盲和推廣以普通話為國家語言，顯然均屬公共物品，因為它們使所有中國人能夠以語言和文字交流溝通。中國的識字率在1949年應遠低於50%，卻自1964年的66.4%提高至2020年的97.3%，部分得益於1950年代漢字簡化方案，以及在1964年編纂的《簡化字總表》。雖然漢字簡化受到不少批評，這些批評有的不無道理，但它令普通人只需接受四年學校教育已能夠閱讀報章，比以往省卻四年時間，確是重大成就。

中國於1986年推行九年義務教育。儘管高中教育不帶強制性，但如今大多數年輕人均已接受過至少十二年教育。僅接受過小學教育或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已經達到頂峰並開始下跌（圖5）。1989年，高中畢業生的高等教育入學率為24.6%，及後在2016年上升至94.5%。這意味現在幾乎每個希望就讀高等教育機構的人都能如願以償（然而，在2021年僅有57.8%的18至22歲人口入讀高等教育機構，因為不是所有該年齡組別的人都完成了高中學業）。在1964年，總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僅為0.42%，2021年則上升至17%，並相信將隨時間遞增⑧。

此外，中國的醫療保健和公共衞生也有莫大改善。如上所述，人口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跌了一半以上，至2021年的0.72%。出生時預期壽命從

圖5　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2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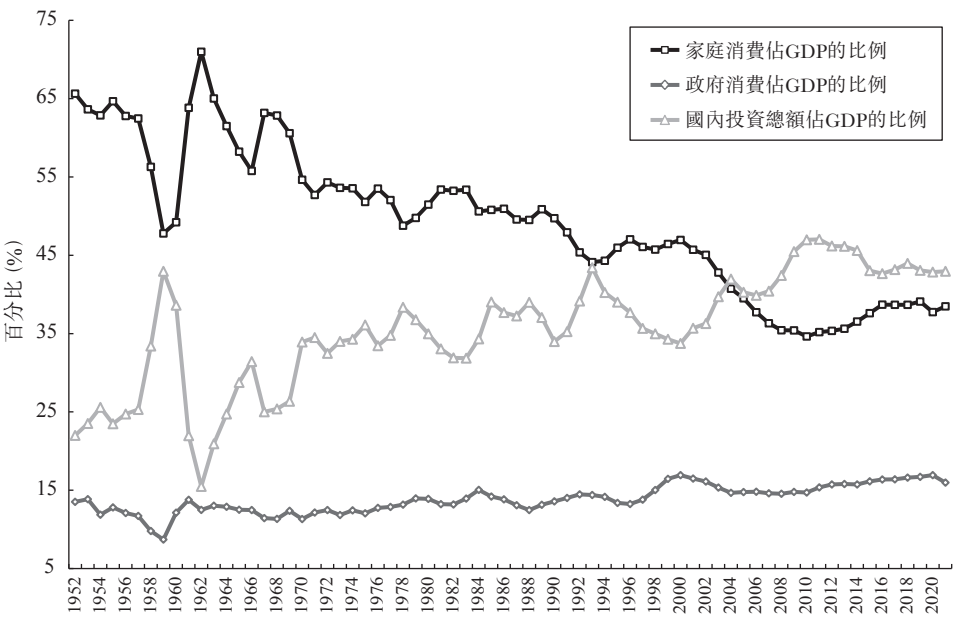
1949年的35歲及1981年的67.8歲，增長到2019年的77.3歲；其時全球人口的出生時預期壽命為72.6歲。在2020年，60歲時平均預期壽命為20.21歲。

四　總需求來源

中國總需求的來源是甚麼？是家庭消費、政府消費、國內投資總額和淨出口。家庭消費在總需求（GDP）的佔比逐漸減少，1962年曾高達近71%，但之後降至2020年的不到38%。自2004年起，包括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在內的國內投資總額，已成為總需求的最重要來源。2020年，其佔比略低於43%。政府消費包含大部分公共物品的消費，其佔比從1952年的13.5%，循序漸進升至2020年的略低於17%（圖6）。政府投資和政府消費均有不少增長空間，尤其是可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如潔淨的空氣和水，可負擔的通訊、交通和電力。鑒於中國致力達至國際貿易平衡，淨出口在中國總需求中的相對重要性將持續下降⑨。

在短期內，所有政府支出的增加對GDP和就業市場都具有相同的宏觀經濟影響。但是，從長遠看來，增加實際固定資產投資，會令實際資本存量及實際GDP增加；而通過減稅和轉移支付等方式增加可動用收入，從而增加消費，並不能產生直接和持久的效益。在通訊、交通和電力等基礎建設方面的投資，可補足非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提高後者的回報率（試想一條新的

圖6　總需求來源的百分比分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

高速公路可如何促進和幫助沿線企業之間擴展貿易）。基礎建設投資所帶來的收益，縱然不能完全由項目本身獲取或內化，但可在經濟中廣泛分享。

此外，中國的許多基礎建設投資都是「領先發展」，以供應創造對自身的需求，而非「滯後發展」，即僅在需求出現後才作出投資。「領先發展」的基礎建設投資可以產生顯著的外部效應，並提高其他公共和私人固定資產投資的回報。有了輔助的基礎建設，就可以使市場更具效率（即「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合作）。

在2008至2017年間，包括實際基礎建設投資在內的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在中國急速增長，部分是為了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自2017年起，它們的增長率大幅放緩。在2003至2021年間，基礎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所佔的比例為30%至40%之間，平均為35.8%。通訊和交通方面的基礎建設投資，也有助於中國經濟成為單一統一市場，獲取由規模經濟造就的巨大收益⑩。然而，基礎建設投資經常產生被稱為外部效應的收益，這些收益不能回饋到本身的投資項目，因此必須靠政府資助或補貼。

家庭消費於家庭可動用收入的佔比也漸趨下降，從1988年的逾90%減至2021年的68.6%。此外，隨着中國日益城市化，家庭消費佔家庭可動用收入的比例可能會進一步下降，因為比起農村家庭，城市家庭有較高的儲蓄傾向。2021年，農村家庭和城市家庭的消費，在各自可動用收入中分別佔84.1%和63.9%。自1949到2021年，農村人口的比例從近90%下降到略高於35%。因此，家庭可動用收入增加，似乎不足以令總需求中家庭消費這個環節顯著增加。國家需要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和政府消費的增加，就此而言，基礎建設投資和公共物品供給的作用就舉足輕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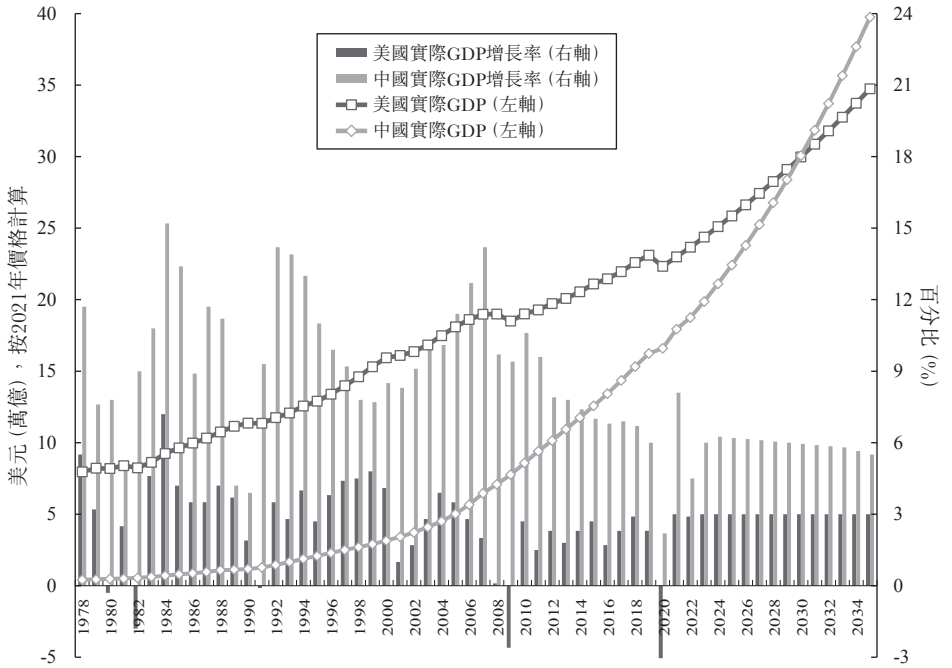
五　未來預測

在圖7和圖8中，可見我們對中美實際GDP和實際人均GDP水平和增長率的長遠預測。兩個圖表所根據的假設是，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每年將在4.5%至6%之間，而美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為每年約3%，相當於其過去數十年的平均值。在我們的推算中，已經將近期中國新冠肺炎（COVID-19）病例急增，以及美國利率上升的短期負面影響納入考量。我們假設中國經濟2022年的增長率將低於其5.5%的目標。

根據我們的推算，中國的實際GDP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30.07萬億美元，趕上美國29.98萬億美元的實際GDP（按2021年價格計算）。從中亦可見在2030年，中國的實際人均GDP為2.05萬美元，仍遠遜美國8.62萬美元的實際人均GDP（按2021年價格計算），及不上美國的四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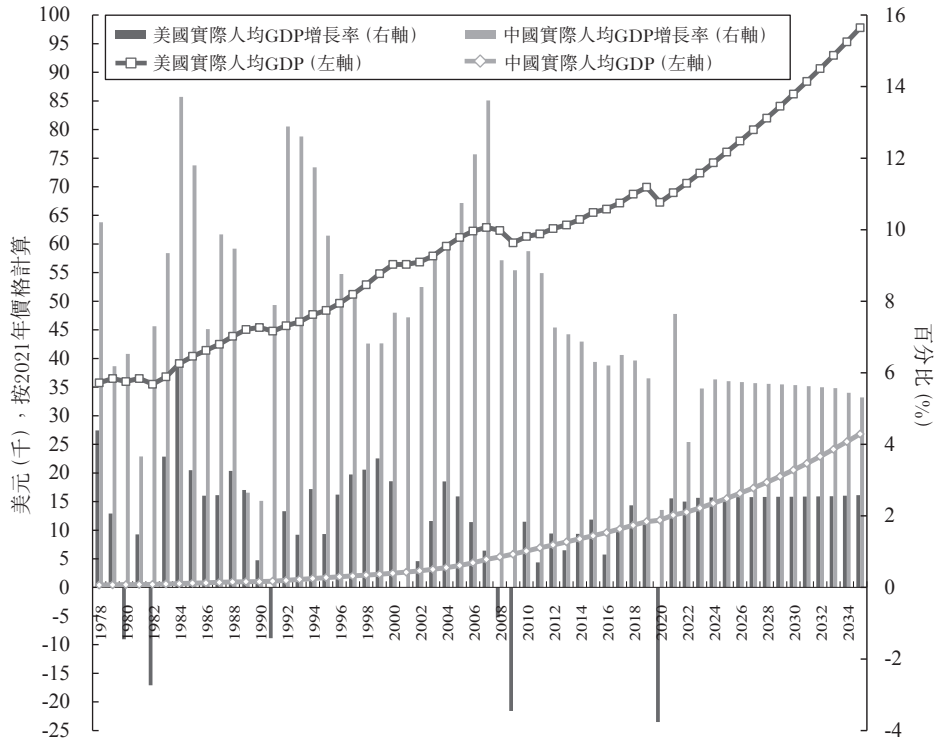
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明顯在逐漸放緩（見圖1自2007年開始的數據），這種趨勢相信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可能像1978至2018年的往績般，永遠

圖 7　中美實際與預測 GDP 及其增長率，1978 至 2035 年



資料來源：由筆者推算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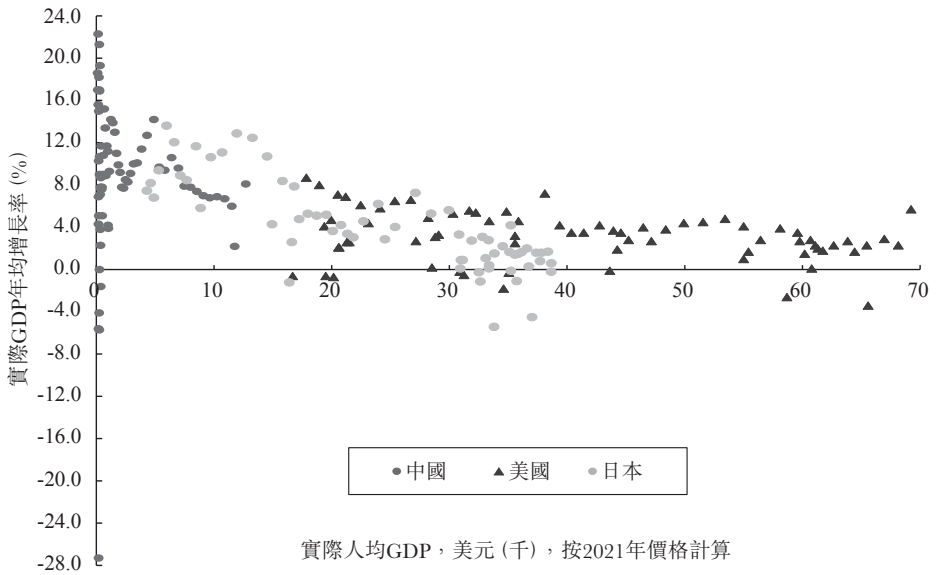
圖 8　中美實際與預測人均 GDP 及其增長率，1978 至 2035 年



資料來源：由筆者推算繪製。

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長。其實，從經驗得出的規律是，當一個經濟體的實際人均GDP上升，其實際GDP的增長率就會下降，中國經濟也不例外。圖9說明了這點，圖中標示出中國、日本和美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與各自實際人均GDP水平的對比。正如預期，實際GDP增長率與實際人均GDP的關係此消彼長。

圖9　中國、日本和美國實際GDP增長率與實際人均GDP水平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Statistics of Japan網站，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國際金融統計」（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然而，我們注意到中國在2021年的人均GDP為12,699美元，根據日本和美國的經驗，這水平屬年均增長率可遠高於6%的範圍。因此，假設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左右的平均增長率為接近6%，亦非癡人說夢。中國實際人均GDP預計在2035年後達到30,000美元（按2021年價格計算），或許到時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將降至5%或以下。

六　潛在的風險與挑戰

中國經濟在未來約十年面臨重大的潛在挑戰和風險，包括：(1) 中美經濟脱鈎；(2) 無法進口高科技產品；(3) 經濟碎片化。

中美經濟似乎無可避免地將以某種形式脱鈎，這既是因為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和其他可能在未來出現的病毒，也因為兩國的戰略競爭日益加劇。中美戰略競爭將成為未來十年的新常態。脱鈎可被視為經濟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這顯然會令全球經濟中所有參與者的經濟選擇集合減少，使經濟

利益受損。脫鈎還會擾亂現有供應鏈，在短期內會增加生產成本、延長生產周期。

然而，從長期來看，經濟脫鈎亦非完全負面。第一，它促使每個經濟體加快尋找和開發第二潛在供應源。若建立潛在的第二個供應源，即使遇到可能令供應鏈中斷的突發事件，如各種自然災害(地震、龍捲風、海嘯和火山爆發)、戰爭、革命及其他地緣政治衝突，經濟大體可不受影響。第二，有了潛在的其他供應源，且假使可以防止串通合謀的話，個別供應商的壟斷能力會降低，市場競爭會更加激烈，價格下降，對所有消費者和用戶均有利。第三，當每個產品、服務和供應鏈都有兩個或多個供應源，便可降低世界經濟體系大規模癱瘓的機會。冗餘供應可被視為避免體系全面失靈的保險。第四，資本市場間的脫鈎，會降低中美投資者的回報率。但中國擁有世界最高的國民儲蓄率，就其資本需求而言，中國經濟大致可自給自足。最後，減少或消除壟斷後，理應會降低以國際經濟政策為武器的效用，例如出口管制、禁止參與電子支付和其他服務，以及懲罰性關稅等，使它們形同虛設。

至於無法進口高科技產品，不僅是由於中美經濟脫鈎，亦因為美國要求第三國的先進半導體及最先進半導體生產設備的製造商，實施對華出口管制。欠缺這些進口產品，或會為部分中國高科技企業帶來短期營運困難。不過，此舉必定會促使企業加快尋找替代品，儘管這需要一些時間。值得注意的是，達到目的的方法通常不止一種，一旦知道某個方向可行，要尋找替代方法並不難。因此，本地開發的替代品，最終會在中國出現。

中國經濟的碎片化對中國不利。或許，這是隨狹隘地方主義或地區主義而起的現象(與二十世紀初的軍閥割據相似)。它對中國內部造成的負面影響與經濟去全球化完全相同。每個分散地區的選擇集合將明顯減少，其利益亦隨之減損。雖然這種情況不大可能發生，但是會為部分不希望中國發展或強大的國家所樂見。假如中國真的割裂成七個板塊，每一板塊將不再擁有中國一統時的經濟、政治或軍事實力，也不再享有龐大而統一市場的規模經濟。中國將會變成另一個歐洲，缺乏以凝聚和果斷方式行事的能力，而這可能符合美國甚或日本的期望。

七　結語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不僅在於數量上的增長，其增長的「質量」亦顯著提高。大部分質量的提升，均有賴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公共衞生、環境保育、保護和修復等。公共物品的供給亦增加了總需求、實際資本存量、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和其他固定資產投資的回報率，從而提高中國經濟的潛在GDP。除了增加家庭消費，增加基礎建設投資和提供公共物品，都可以為增加對消費和投資的國內總需求提供更大

動力。儘管基尼系數顯示中國的收入不均程度大增，但自1978年以來，由於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全體中國人民的福祉均已顯著改善。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將由內需帶動，而非出口。中國經濟不受產能或供應不足所囿。中國經濟繼續繁榮的關鍵，是保持國內總需求的適度增長。技術進步，也即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亦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中國經濟亦須繼續保持開放。若非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經濟無法置身今天的位置。自力更生不應等同完全自給自足。我們應該時刻記住，這是雙循環、而非單循環的發展戰略。中國與美國及世界各地的教育交流也應盡量維繫和繼續。除了楊振寧教授，中國還得到鄧稼先、錢三強、錢學森和朱光亞等曾於海外留學或工作的科學家之協力。少了他們，可能就不會那麼快取得「兩彈一星」的成果。

在2004年的訪問中，我預測中國經濟在2035年前均能夠保持高速增長，GDP在三十五年內(即2039年前)趕上美國。現在看來，中國經濟將能夠提前在2030年左右與美國經濟並駕齊驅。2030年也適逢楊教授的「茶壽」，我們期盼屆時有更盛大的壽慶。

梁雅婷 譯

註釋

① 劉遵義：〈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展望〉，《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4年8月號，頁4-10。

② 根據2021年底美元/人民幣的市場匯率並按2021年的價格計算，將人民幣換算成等值美元。

③ 基尼系數衡量的是經濟體中個人收入分配不平均的程度，數值愈高，代表收入分配愈不平均。

④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以「購買力平價」(PPP)的國際元計算，2017年中國的GDP已超越美國。

⑤ 「劉易斯拐點」指農業部門已無剩餘勞動力。

⑥ 一些等待接替上司職位的員工，也反對延後法定退休年齡。為行政職位訂立任期上限，可緩解這些阻力。例如，一名醫生最多只能擔任兩屆醫院院長，但之後仍可在醫院繼續擔任醫生，直至達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齡。

⑦ 「長尾效應」指因為中國人口龐大，中國超優人才的比例也會特高的現象。

⑧ 2021年的數據來自2022年5月17日的教育部公告。

⑨ 近期淨出口在GDP的佔比增加，部分原因是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造成的混亂所致。

⑩ 2022年4月26日，在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國家「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劉遵義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李國鼎經濟發展榮休講座教授。